

# Selden Map 有關臺灣與琉球 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 兼論北港與加里林的位置與地緣意涵\*

陳宗仁\*\*

## 摘要

Selden Map 典藏於英國牛津大學 Bodleian 圖書館，繪製於十七世紀初期，近年頗受學界關注。本文分析 Selden Map 有關臺灣、琉球海域的描繪，分別針對圖形、文字標註及針路討論。依據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初期中國、日本及歐洲地圖對於臺灣、琉球海域描繪的異同，指出圖形受到歐洲 Mercator 型地圖的影響。地名與航路的分析，顯示臺灣與琉球都不是繪者關注的重點，但關於臺灣、琉球海域的地名與航路均受到福建水手的海域知識影響。整體而言，Selden Map 有關臺灣、琉球的描繪，和對日本海域的描繪方式相同，均在十六世紀葡萄牙海圖的基礎上，加上唐人的海域知識。

本文另一重點是討論琉球國、北港及加里林的意涵，認為「琉球國」只是前往日本路程中的航行指標，琉球的「大交易時代」業已結束。至於臺灣海域標註「北港」與「加里林」這兩個地名，本文認為北港應該在古剗港內海，加里林則是彰化的二林。這兩個地名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最初是區域性港口，但是在十六世紀唐人沿著臺灣西海岸捕魚、經商過程中，北港成為閩南船隻經澎湖前往臺灣西岸各港口的結點；至於加里林則是閩南船隻從澎湖直航臺灣中、北部海域時必經的港口。

關鍵詞：唐人、針路、海圖、地圖史、東亞海域史

---

\* 感謝林天人、翁佳音、康培德、鄭維中等教授與簡宏逸博士提供相關研究資料與建議，亦感謝兩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以及助理賴東璿、吳佩璇的協助。本文曾在 2020 年 6 月 23 日於本所宣讀，蒙在場同仁提供寶貴意見，謹致謝意。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稿日期：2020 年 3 月 16 日；通過刊登：2020 年 6 月 30 日。

- 一、前言
- 二、新舊知識並存：東亞地圖的描繪與地理認知
- 三、貿易與航路：歐洲地圖的描繪與地理認知
- 四、通往日本之島：概念化的琉球國及其航路
- 五、臺灣西岸航路結點：北港
- 六、直航臺灣西北海岸的指標：加里林
- 七、結論

---

## 一、前言

Selden Map 典藏於英國牛津大學的 Bodleian 圖書館，被遺忘了數百年，直到 2008 年美國歷史學者 Robert Batchelor 「重新發現」。<sup>1</sup> 這幅圖長約 158 公分，寬 96 公分，與一般的地圖相比，篇幅顯得相當大。內容涉及中國、日本、朝鮮，以及現今東南亞各地，繪圖範圍相當於是現代地理概念中的東亞，年代大約是十七世紀初期。

這幅圖近年來受學術界關注，研究論著相當多，依據筆者見聞所及，自 2011-2019 年間，學界共發表相關研究論著 54 篇，其中專書 3 本，學術論文 43 篇，書評、研究回顧等 10 篇。<sup>2</sup>

---

<sup>1</sup> 此圖原為當時英國著名政治人物 John Selden (1584-1654) 所有，他過世後，其後人於 1659 年將此圖與其他書籍捐給牛津大學的 Bodleian 圖書館。此圖館藏編號 MS. Selden supra 105，名稱為“The Selden Map of China”，但此圖繪製涉及東亞，而非僅繪中國，故本文簡稱為 Selden Map。

<sup>2</sup> 筆者的統計資料，未刊稿。關於此圖研究成果評述，可參見陳宗仁，〈Mr. Selden's Map 有關日本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收於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8），頁 359-365；張麗玲，〈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评述〉，《海洋史研究》（北京）9（2016 年 7 月），頁 377-393；龔纓晏、許俊琳，〈《雪尔登中国地图》的发现与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北京）2015:3（2015 年 7 月），頁 100-105。又，2011 年此圖修復完成，目前 Bodleian 圖書館網頁提供細部圖像瀏覽，甚便觀賞與研究，參見“Selden Map”，館藏編號：MS. Selden supra 105，下載日期：2020 年 6 月 10 日，網址：<https://bit.ly/3kkFXuz>。



圖一 Selden Map 琉球、臺灣海域局部

資料來源：“Selden Map”，館藏編號：MS. Selden supra 105，下載日期：2020年6月10日，網址：<https://bit.ly/3kkFXuz>。

目前有關 Selden Map 的研究成果與課題可區分為兩種研究取向，一類是探討圖名、繪製年代、作者與繪製地、局部圖像的意涵、全圖繪製手法等，這是對此圖基本資料的研究，亦即就此圖論此圖。另一種研究方式是探討此圖的時代意義，如卜正明、聶洪萍等，試圖說明此圖顯露當時的南海貿易。研究成果雖然豐富，但觀點相當歧異，此一現象可說是此圖研究的特點，也反映了目前研究的瓶頸，而瓶頸產生的原因當然與史料不足有關。除 Selden Map 留存外，目前沒有其他直接相關的文獻，只有地圖送到英國後，才有一些的文獻記載。因此，對於此圖的研究，只能仰賴圖中文字、圖形、材質的分析，換言之，只能「細續」此圖了。

筆者從 2013 年開始研究此幅地圖，認為應將此圖視為某種或多種地理知識的呈現。十六、十七世紀時，歐洲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英國均派船在東亞海域活動，累積相當多的航海與地理知識，而且有著各自的特色；<sup>3</sup> 筆者認

<sup>3</sup> 陳宗仁，〈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臺北）41（2008年6月），頁 109-164。

為此圖呈現了十七世紀初期海外唐人的世界觀，<sup>4</sup> 而這種世界觀或地理描繪方式則是十六世紀以來東亞海域各種海上勢力互動、交流下的結果。因此，經由圖幅某些地域的細部分析，分析地理知識的構成與敘事方式，將有助於探討此圖之斷代與繪製的背景，以及當時唐人在各海域的活動情形。

此圖在日本南方海域到呂宋島之間，描繪著一些大小不等的島嶼。大致可以歸納為兩個島群，一是在日本南方的島群，其中有個大島，名稱是「琉球国」，另一島群位在琉球、福建及呂宋島之間，有三個地名：「北港」、「加里林」、「彭」。另外，在這些島嶼間有一條曲折的黑線，代表當時的航路，線旁並標註航向的羅經針位。本文探討此一海域圖形的描繪，以及地名與針路的知識來源；由於學界對於「北港」、「加里林」的位置有爭議，筆者擬利用這幾年搜集的史料，討論這兩個地名的位置，以及在十七世紀初期臺灣海域的重要性。

## 二、新舊知識並存：東亞地圖的描繪與地理認知

Selden Map 有關中國、朝鮮的描繪，其圖形均依據大明國的地理知識與地圖之圖繪，日本的圖形則受到歐洲 Mercator 型地圖的影響。<sup>5</sup> 關於琉球、臺灣海域的描繪是繪者自行測繪，或是另有所本？是否受到日本、大明國或歐洲地圖的影響？筆者依據蒐集的地圖史料，針對十六世紀下半葉、十七世紀初的地圖，進行比對，並探討各類地圖繪製的角度與其依據的地理知識。

---

<sup>4</sup> 十八世紀以前中國大陸沿海的人前往臺灣、日本、中南半島、東南亞島嶼一帶進行商業、農墾、移民等活動，他們自稱為「唐人」。本文主要談論出海經商的福建人，使用「福建人」此一概念時，強調他們與福建的關係，使用「唐人」時，則是關注他們在海外的活動、見聞及形成的海域知識（如外國地理、航路等）。

<sup>5</sup> 筆者相關論文：陳宗仁，〈Selden Map 有關朝鮮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曹永和文教基金會、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研究所主辦，「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館北棟3樓第一會議室，2014年7月14日）；陳宗仁，〈Selden Map 有關中國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發表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第9屆文化交流史暨輔大歷史學系在臺50週年：傳承與涵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北：輔仁大學野聲樓一樓谷欣廳，2013年11月10日）；陳宗仁，〈Mr. Selden's Map 有關日本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頁365-397。

## （一）中國圖籍的描繪

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初期中國地圖對此一海域的畫法，大致可以島嶼數的多寡，區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在海域裡僅繪出一或兩個島嶼，另一類是描繪很多島嶼。

### 1. 標示琉球或大、小琉球

十四世紀末繪製的〈大明混一圖〉裡，福建外海標註「澎湖」，在其東南方有一橫條形島嶼「流求」，流求南方有一長條形島嶼「大流求」。雖然流求與大流求並存，不過這種現象不宜解讀為此處存在兩個島嶼，而應視為兩種知識的混合，一種是源自七世紀《隋書·流求國傳》，再加上十三世紀《諸蕃志》、《文獻通考》之類書籍的增補，以及十三世紀末蒙古人派兵攻打流求，逐漸形成澎湖（龜鼈嶼、高華嶼）與流求相關的地理認知；至於大流求則是十四世紀大明使者出使沖繩島，雙方朝貢關係建立後出現的地名概念。<sup>6</sup> 這兩種地名概念均流傳於十六世紀。如十六世紀初明朝官員費宏（1468-1535）在〈送福建按察司副使陸公君美序〉中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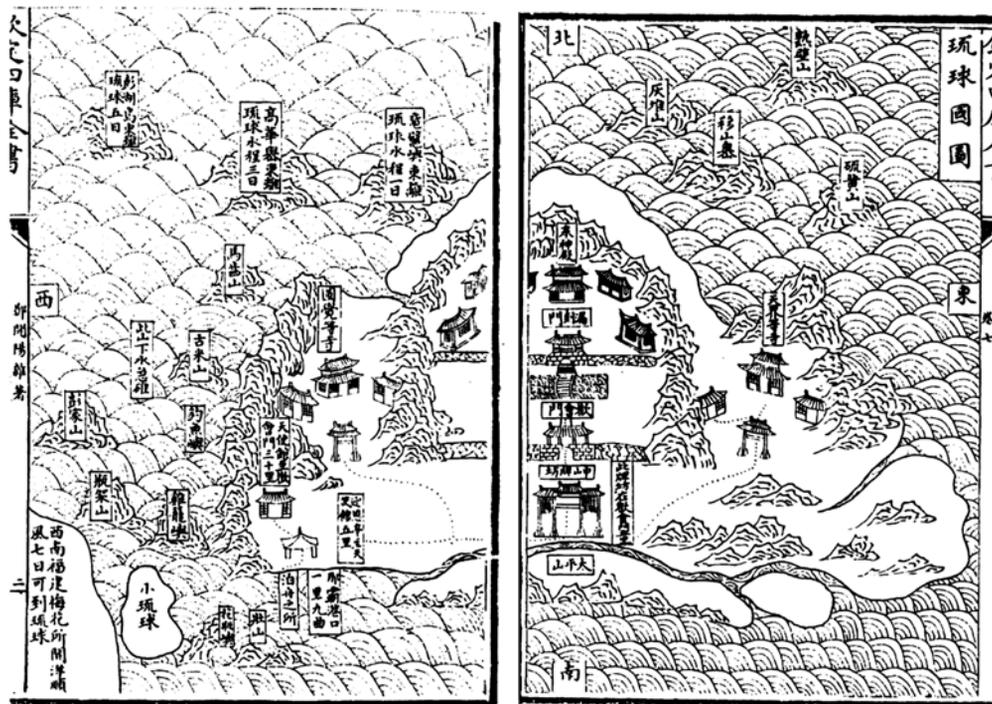
琉球、日本諸海國去閩僅數千里，而澎湖、龜鼈、高華諸嶼隱然可數于煙波浩淼之間。奇貨珍材以售于華人，獲輒數倍。故濱海冒禁之民，往往通賈胡，駕巨舶，倚風濤，旁午出沒，或乘以鼓行攻劫，而下郡輒騷動無甯居。<sup>7</sup>

這段文字說明福建沿海居民已冒禁出海，至琉球、日本海域貿易，但費宏提到的地名是琉球、日本及澎湖、高華等嶼，這種地理認知是沿續《隋書·流求國傳》以來的敘事傳統。<sup>8</sup> 十六世紀中葉鄭若曾的〈琉球國圖〉左上方即呈現此種地理

<sup>6</sup> 中文文獻關於流求與澎湖的記載與沿革，可參見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74-113；大、小琉球概念的形成，參見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4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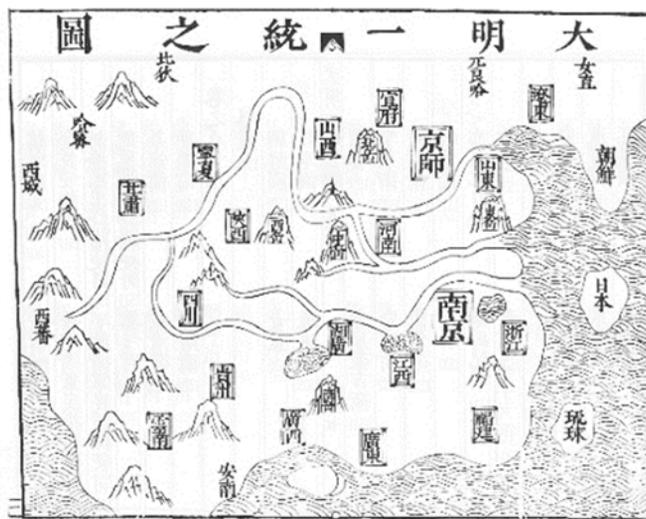
<sup>7</sup> 費宏，〈送福建按察司副使陸公君美序〉，收於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9，頁435。

<sup>8</sup> 徐曉望對此段文字的解釋是，當時有人從事日本、琉球與中國之間的海上貿易並兼行劫掠，因此，「在費宏生活的時期已經有華人登陸臺灣島，並在那裡與琉球人及日本人做生意。他們主要是福建漳州人與廣東潮州人」，參見徐曉望，〈論明萬曆二年福建水師的台灣新港之戰〉，《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福州）2019: 11，頁109-110。但這是過度的推論，費宏對臺灣、琉球海域恐怕沒有具體的認識。〔按：中國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以下同〕。



圖二 〈琉球國圖〉

資料來源：鄭若曾，《鄭開陽雜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7，頁1b-2a。



圖三 〈大明一統之圖〉

資料來源：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卷1附圖。

認知（圖二）。

另一類地圖則表現大明朝貢體制下的琉球國或大、小琉球。十五世紀《大明一統志》的〈大明一統之圖〉（圖三）在福建外海描繪一個島嶼，標註「琉球」。這種畫法淵源自傳統的華夷地圖表現手法，對於「夷」，僅是強調其名稱及其與中國王朝的相對位置，而不是表現「夷」的實際形狀。十六世紀採取此類畫法的地圖相當多，<sup>9</sup> 這類地圖提到的琉球，都是朝貢脈絡下的國名概念。

有些地圖亦在此一海域標示大琉球與小琉球，甚至加上了澎湖，如《廣輿圖》的〈東南海夷圖〉（圖四）、《籌海圖編》卷 1 的〈輿地全圖〉、〈日本島夷入寇之圖〉。<sup>10</sup> 在這些地圖裡，大琉球較接近日本，而小琉球較靠近福建。



圖四 〈東南海夷圖〉局部

資料來源：朱思本原圖，羅洪先、胡松增補，《廣輿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517。

## 2. 標示琉球、臺灣島群

十六世紀有些圖籍標示福建至日本之間的海域有很多島嶼，這種畫法是受到當時航海知識的影響，屬於新的、來自民間的地理知識。1534 年（明嘉靖 13 年），明朝派遣陳侃出使琉球，他將此段歷程撰寫成《使琉球錄》，書中記錄詳細的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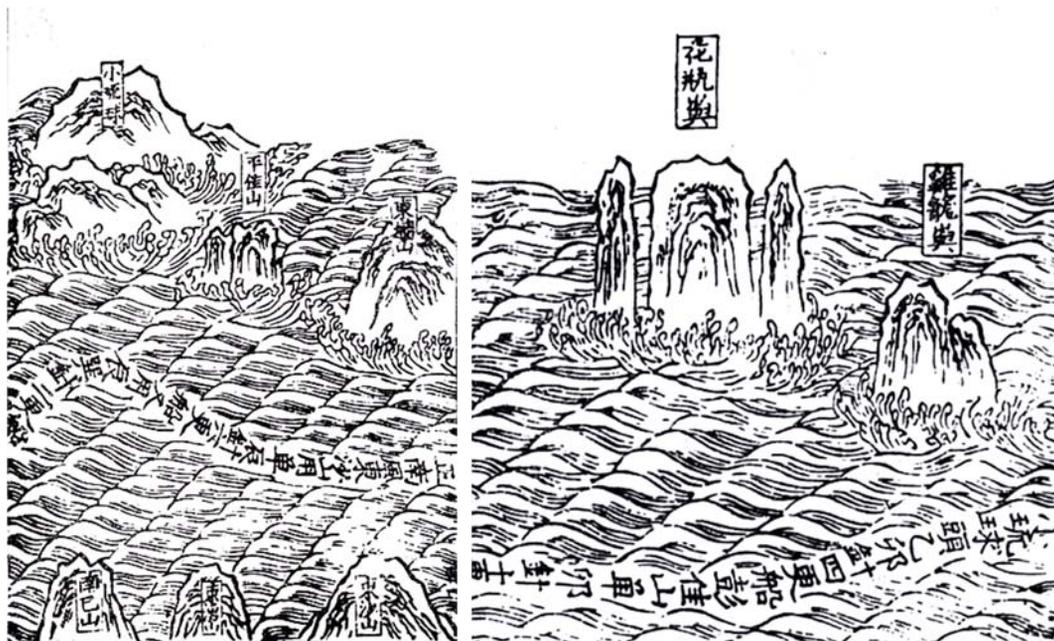
<sup>9</sup> 如十六世紀上半葉的〈楊子器跋輿地圖〉、廖世昭《志略》的〈大明一統圖〉，以及 1550 年代以後的〈古今形勝之圖〉、羅洪先《廣輿圖》的〈輿地總圖〉。

<sup>10</sup> 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3、211-212。

經過，使我們了解當時福建船隻前往琉球的航行路線，航程中歷經的島嶼亦收錄於書中，如小流求、平嘉山、釣魚嶼、黃毛嶼、赤嶼等，<sup>11</sup> 這些均出自福建慣熟海道者的航海知識。

1579年（萬曆7年），又有蕭崇業奉使琉球，他亦寫作《使琉球錄》，書中有〈琉球過海圖〉（圖五），描繪航路所經島嶼，並標以針位、更數，屬於所謂的「針路圖」。

上文提及1560年代鄭若曾的〈琉球國圖〉（圖二），此圖在左上方使用了十三世紀時的流求概念，描繪了澎湖島、龜鼈嶼（龜鼈嶼）及高華嶼，但〈琉球國圖〉表現的重點其實是琉球國及其與大明的朝貢關係，因此，琉球國都城所在的



圖五 〈琉球過海圖〉局部

資料來源：蕭崇業、謝杰，《使琉球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11-16。

<sup>11</sup> 陳侃、高澄，《使琉球錄》，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使琉球錄三種》（臺北：該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287種，1970；1534年原刊），頁11載：「至（五月）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風甚迅……。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鼓舞於舟，喜達於家」。





圖七 〈福建海防圖〉局部

資料來源：孫靖國，《輿圖指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12），頁 331-332。

記載航路資料，並繪製航海圖〈滄海津鏡〉（圖六），圖中除了有小琉球與大琉球國之外，又載甚多島嶼，如雞籠山、瓶架山、花瓶嶼、釣魚嶼、赤坎嶼等。不過這些島嶼的描繪並不強調各島的方位與實際位置，只是在小琉球與大琉球之間排成一列。

再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福建海防圖〉為例，此圖除了描繪福建沿岸、近海島嶼，還包含遠洋島嶼：即北起琉球群島之沖繩島，再南為臺灣島群，最南為呂宋島群。此圖仍屬大明國的海防圖，卻是首幅較詳細描繪上述三島群及其與福建相對位置的地圖，且記載上述三島群各港地名。筆者認為其繪製時間是 1610 年代。其中琉球國的畫法仍強調港口、天使館及琉球國所在之城（圖七），類似鄭若曾〈琉球國圖〉的敘事概念。至於臺灣島則畫成很多島嶼，成群排列於福建外海，形象地呈現「東番諸山」的想法。<sup>12</sup>

以上分述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初期中國圖籍有關琉球、臺灣海域的描繪，就圖形的描繪而言，大致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一類型是標示此一海域僅有「琉球」，或是有大琉球與小琉球，屬於傳統華夷地圖的表現手法。另一類型是標示此一海

<sup>12</sup> 1610 年代福建巡撫黃承玄使用「東番諸山」此語，同時期繪製的〈福建海防圖〉亦描繪臺灣海域有很多小島，詳細論述參見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臺北）23:3（2016 年 9 月），頁 1-42。

域有很多島嶼，其中最大的島嶼是琉球國，其次是小琉球，此外還有很多小島。這種畫法與十六世紀針路圖、海防圖有關，也與 Selden Map 對於此一海域的描繪類似，但兩者仍有不同，即中國圖籍描繪琉球、臺灣海域有很多島嶼時，觀看的角度是從中國海岸，特別是福建往大海看，如果是海防圖，更強調近岸島嶼；但 Selden Map 的描繪強調的是從福建到臺灣、琉球，一直至日本，都有很多島嶼，其概念類似《使琉球錄》的針路資料與針路圖。Selden Map 對島嶼的表現方式與針路圖相比，前者試圖表現島嶼的相對位置與距離，但針路圖是以針路先後為觀看重點，島嶼依序排列而已。

因此，如上所述，Selden Map 的臺灣、琉球圖形與中國圖籍所繪不同，兩者有著不同的敘事思維，部分中國圖籍只想說明海外有琉球或大小琉球，是華夷圖的表現手法，另一類則強調針路線上的島嶼，但對於 Selden Map 而言，繪者想強調的是整個東亞實際地理空間裡臺灣、琉球等島嶼的位置。

## （二）日本或朝鮮地圖的描繪

日本與朝鮮在十六世紀以前，對於琉球或臺灣的地圖資料相當有限，日本橫濱金澤文庫收藏一幅日本圖，約繪於十四世紀初，圖中西南方繪有一地名「龍及」，即指琉球。<sup>13</sup> 十五世紀初，朝鮮官員繪製了著名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原圖已佚，日本龍谷大學收藏十五世紀後期摹繪本，在日本九州與福建之間，描繪了三個島嶼，名稱是「大琉球」、「琉球」、「彭湖」，<sup>14</sup> 這種描繪方式與〈大明混一圖〉相同。這兩種地圖對琉球海域的描繪都著重地名與相對位置，與上節中國地圖的描繪方式相同。

1471 年朝鮮官員申叔舟所編《海東諸國紀》，書中收錄一幅〈琉球國之圖〉，是最早詳細描繪琉球國的地圖。圖中標註十餘處城堡名與港口名，島上有兩處城牆圖繪，分別標註「琉球國都」與「國頭城」。此圖亦標註航路，以琉球、上松浦及奄美大島為起點，通往赤間關、兵庫浦、惠羅武（永良部），即從琉球各島到日本，又以日本漢字標註琉球島上的地名如「玉具足」、「那波」，故推測原圖繪製者

<sup>13</sup> 秋岡武次郎，《日本地圖史》（東京：有限会社ミュージアム圖書，1997），頁 36-37。

<sup>14</sup> 楊雨蕾、鄭晨，〈多元的認識：韓國古輿圖中的琉球形象〉，《海交史研究》（泉州）2018:2（2018 年 12 月），頁 42、52。

是具有琉球航海經驗的日本人。<sup>15</sup>《海東諸國紀》另收錄〈海東諸國總圖〉、〈日本本國之圖〉、〈日本國西海道九州之圖〉等，呈現了十五世紀朝鮮對於日本、琉球的認知，特別是九州與琉球一帶海域情勢。

至十六、十七世紀時，此書仍流傳於朝鮮、日本。如長崎縣島原市的本光寺收藏另一幅〈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摹本，學者推定為 1560 年代所繪。<sup>16</sup>此圖對於大琉球的畫法與龍谷大學所藏摹本不同，而是替換成《海東諸國紀》之琉球國圖形，顯示十六世紀本光寺摹本的繪師較為重視《海東諸國紀》。

《海東諸國紀》所收各圖並未描繪小琉球（臺灣），十六世紀初的增訂本新增了小琉球的訊息，但無圖繪，其文字謂：

（琉球）國之東南水路七八日程有小琉球國，無君長，人皆長大，無衣裳之制，人死則親族會而割食其肉。漆其頭，廂以金，為飲食之器。<sup>17</sup>

日本與朝鮮流行的琉球地圖與中國對琉球的描繪方式相當類似，亦有兩種類型，一類是概念化、符號化的描繪，強調地名、與本國（中國或日本）的相對位置，如〈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另一類則是來自琉球當地的訊息或是航海者（海商、水手）的經歷，如《海東諸國紀》之圖。此書之〈琉球國圖〉呈現的是日本九州商人的視野，如同鄭若曾之〈琉球國圖〉是出使琉球使者的見聞。<sup>18</sup>

Selden Map 有關臺灣、琉球海域的描繪，若與中國、日本及朝鮮圖籍相比，顯然不同，最大的差異是 Selden Map 試圖在整個東亞實際地理空間裡，呈現臺灣、琉球等島嶼的位置，而中、日、朝鮮等國圖籍著重的是從自身的角度描繪，華夷圖、朝貢圖強調官員的視野與活動範圍，而針路圖則強調航行所見的指標島嶼。

<sup>15</sup> 而 1453 年博多商人道安作為琉球國王使者前往朝鮮時，曾帶去日本與琉球地圖，故〈琉球國之圖〉的知識來源可能與道安有關。參見田中健夫，〈《海東諸國紀》の日本、琉球国：その東アジア史的意義と南波本の紹介〉，收於田中健夫，《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国際認識》（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 126-130。

<sup>16</sup> 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7），頁 14。

<sup>17</sup> 申叔舟著、田中健夫譯注，《海東諸國紀：朝鮮人の見た中世の日本と琉球》（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 375，附錄三引文。按臺灣島在沖繩島之西南，此處謂東南水路，顯然方位有誤，但其描述之頭骨鑲金風俗應指臺灣。

<sup>18</sup> 兩者地理知識雖來自海商、水手，但地圖呈現的重點並不相同，田中健夫認為《海東諸國紀》之〈琉球國圖〉屬海洋圖，而《鄭若曾雜著》之圖是王城圖，參見田中健夫，《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国際認識》，頁 68-70。

十六世紀末日本人依據歐洲地圖繪製日文之航海圖、南蠻屏風地圖，如〈東洋諸國航海圖〉、〈西洋鍼路圖〉均屬 Dourado 型地圖，與 Selden Map 無關，詳見第三節所論。

### 三、貿易與航路：歐洲地圖的描繪與地理認知

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初歐洲地圖對臺灣、琉球海域的描繪並無新舊知識並存的問題，因為他們對於這一海域的描繪與地理認知都是地理新發現的一部分，起源於葡萄牙人為了尋求貿易機會而記載的航路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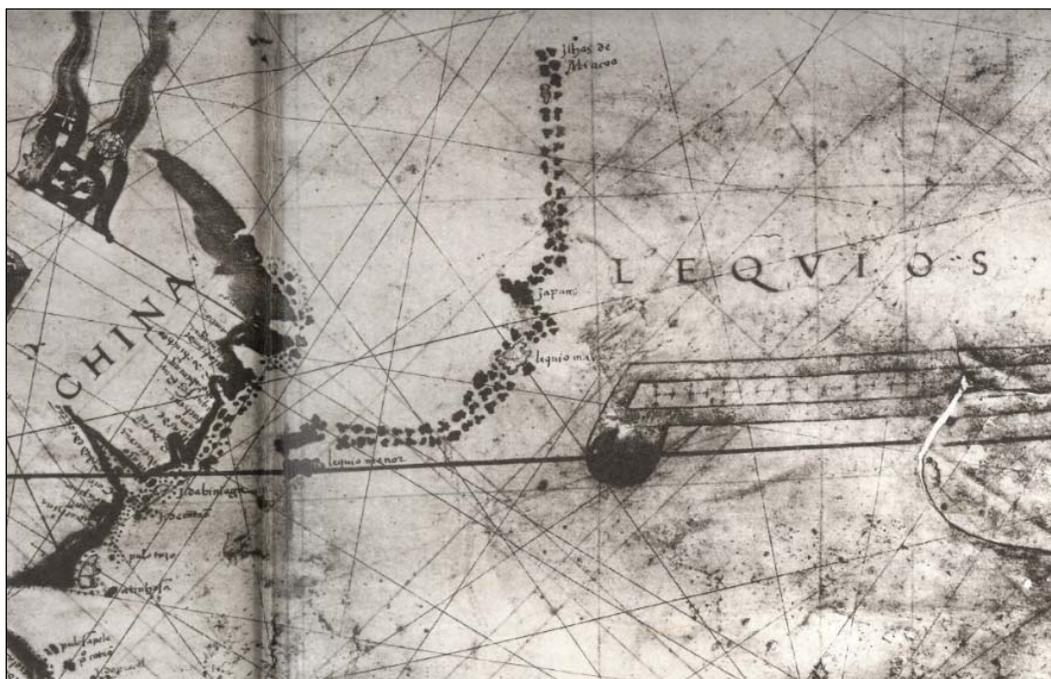
1511 年葡萄牙船隊抵達麻六甲後，他們接觸到一些對他們友善的商人，如「os Lequios（琉球人）」。<sup>19</sup> 十六世紀歐洲人對琉球、臺灣海域的認知與描繪，就從葡萄牙人探索琉球商人的居住地開始，反映在地圖的描繪上，則是當時歐洲繪圖者如何在地圖中呈現 Lequio / Lequios 的地理認知。

1540 年代葡萄牙人隨著唐人來到日本，他們發現這個國家遠比琉球重要，充滿貿易與傳教的機會。當時葡萄牙商人與傳教士往來於中國沿海與日本之間，對於臺灣、琉球及日本海域的地理知識逐漸增加，這類知識傳回歐洲後，引起歐洲地圖對此一海域描繪的變化。可以依圖形類型的不同，區分為四類：Mercator 型、Homem 型、Ortelius 型及 Dourado 型，關於這四種圖型的內容與特點，筆者曾撰〈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一文探討。<sup>20</sup> 由於 Mercator 型地圖與 Selden Map 的臺灣、琉球描繪有關，以下做較詳細的敘述。

羅馬的 Vallicelliana 圖書館收藏一幅世界圖（圖八），此圖對中國大陸海岸線的描繪僅止於寧波一帶，應是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活動，從廣州灣持續向北擴張到漳州、寧波，但尚未至日本的時期，故不了解中國北方海岸的地形，但對日本、琉球島群有些微的認知，顯示是 1540 年代前後葡萄牙人的地理知識。

<sup>19</sup> 關於十六世紀初期葡萄牙人與琉球人的接觸，可參見金国平，〈从葡萄牙语及琉球汉语文献论析 Cheilat 之生平与事迹〉，收於金国平，《澳门学：探蹟与汇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頁 26-55。

<sup>20</sup> 陳宗仁，〈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頁 109-164。



圖八 Vallicelliana 圖書館收藏之世界圖局部

資料來源：中村拓，《鎖国前に南蛮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図 III》（東京：東洋文庫，1967），圖 1。

在此圖中，北回歸線以北、中國大陸東方海域繪有一長串島嶼群，兩兩竝排。左下方有兩個較大島嶼，文字標註為 *lequio menor*（小琉球），北回歸線通過其中一個島嶼；島群從此向東，再折向東北，出現另一較大的島嶼 *lequio mayor*（大琉球）；從此島群向上，有另一島較大，標註 *Japan*；島群最上方為 *Ilhas de Miacao*（都，指日本之京都）。此圖表達的概念是：從臺灣至日本一帶海域，有一長串並排相連的島嶼群，其中夾雜幾個大島，即小琉球、大琉球、日本（指九州）、京都。在此一島群東側，以較大字體標註為「LEQVIOS」。顯示葡萄牙人認為從臺灣到日本之間的島嶼或海域稱為 *Lequios*（琉球）。

此圖有幾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此圖屬於 Mercator 型地圖的早期樣式，雖然個別島形並不正確，但島嶼群彼此的大致方位不誤，顯示這種島群畫法並非憑空想像；不過，這些島嶼均勻地排列在福建與日本之間，是一種概念化的描繪，而非島嶼的實際分布情形。1518 年 Jorge Mascarenhas 率領船隻前往福建沿海，獲

取一些琉球的地理訊息，得知：

琉球群島在福建以東約百餘里格處，第一個島位於北緯 25.5 度處，然後有一系列的島嶼呈一牆狀，向東—東北和北部延伸。<sup>21</sup>

這段文獻顯示 1510 年代葡萄牙人認為在福建東方海域，有一連串的島嶼，如同城牆般，向東北、北部延伸，而這整片海域的島嶼都稱為琉球群島，上述地圖的描繪正是同一地理概念的展現。而且他們已知第一個島的緯度為 25.5 度，說明葡萄牙人應該已來到臺灣海域，測量了臺灣島的緯度，而且這地點在臺灣島北端。<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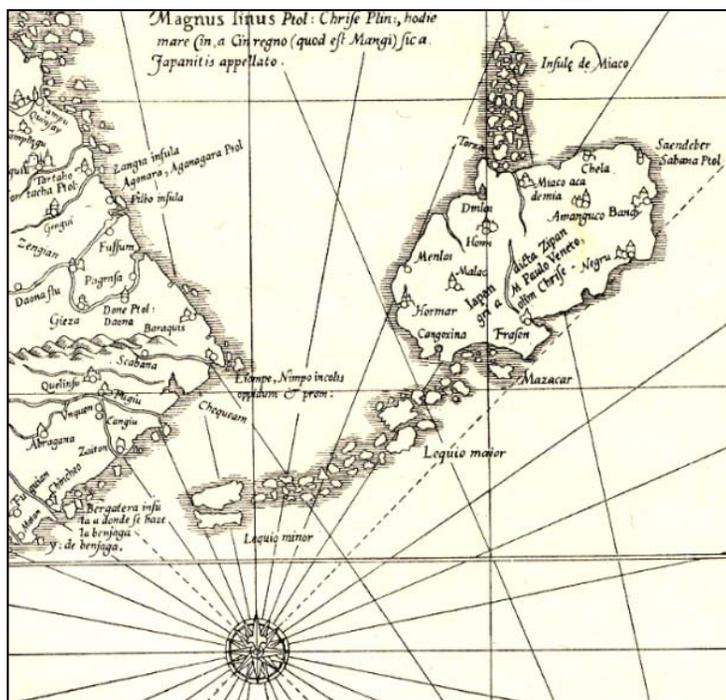
Mercator 型地圖最初見於 1569 年 Mercator 之〈世界圖〉(圖九)，此種圖型的特色與 Vallicelliana 圖書館之圖相同，在中國大陸東方海上描繪一長串島嶼，從福建海面向東北延伸至日本海域，在日本海域與福建之間有一長條狀島群，兩兩併列。但 Mercator 將 Japan (九州) 島畫得很大，並加上一些地名，顯示繪圖者注意到日本的重要，反映了 1540 年代葡萄牙水手、耶穌會傳教士抵達日本之後的地理知識。

1570 年 Abraham Ortelius 出版其著名的地圖集時，在〈世界圖〉與〈東印度圖 (Indiae Orientalis Insularumque Adiacentium Typus)〉(圖十)裡，對日本、臺灣海域的畫法採用 Mercator 所繪之圖形與地名。〈世界圖〉較簡略，僅標註：Miaco、Japan、Lequio；至於〈東印度圖〉與 1569 年 Mercator 之圖比較，在大、小琉球之間增加兩個地名：「ÿ<sup>a</sup> Ferosa、Reix magos」，應為葡萄牙水手所命名。

就臺灣、琉球海域的地名而言，標註琉球、大琉球、小琉球等名稱，這種稱呼應是受到福建水手的影響，但是 Reix magos、ÿ<sup>a</sup> Ferosa 等地名，可能受到下述 Homem 型地圖的影響，或者得到同樣的地理訊息，故在先前的圖形架構上，加上新的地理概念與名稱。

<sup>21</sup> João de Barros, *Décadas da Ásia III* (Lisboa: Na Regia Officina Typografica, 1777), Liv. II, Cap. VIII, p. 221, 中譯文引用自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 頁 230。

<sup>22</sup> 臺灣本島最北端是新北市的富貴角，位在北緯 25 度 18 分，釣魚臺的緯度是 25 度 44 分，而沖繩本島、鄰近的慶良間諸島均在北緯 26 度以北。故葡萄牙人測緯度的地方應在臺灣與釣魚臺列島之間，考量當時葡萄牙船隻前往日本之船線，從福建沿海往東，首先接觸到臺灣島，故葡萄牙人認知的第一個島以臺灣島的可能性較大。



圖九 1569年 Mercator《世界圖》局部

資料來源：中村拓，《鎖国前に南蛮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図Ⅰ》（東京：東洋文庫，1966），頁11。



圖十 1570年 Ortelius〈東印度圖〉局部

資料來源：Abraham Orteliu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Kyoto: Rinsen Book, 1991).

歐洲繪製的地圖對於臺灣、琉球海域的描繪，與對日本圖形的描繪相同，可以區分出四種類型。若與 Selden Map 之圖形比較，則四種類型中的 Mercator 型有關臺灣、琉球及日本海域的描繪方式與 Selden Map 最為相似。以 Ortelius 圖集之〈東印度圖〉為例，兩者相似處是日本海域有一明顯的大島，島的上、下方均有小島；而且大島南方之島嶼群往西南沿伸，大琉球與小琉球兩處有較大的島嶼，但 Selden Map 有關臺灣、琉球海域島嶼的描繪有明顯的轉折，即小琉球到大琉球之間的島群是東西向，大琉球以北的島群是南北向分布，此一現象反而類似 Vallicelliana 圖書館收藏之圖。

## 四、通往日本之島：概念化的琉球國及其航路

在 Selden Map 裡，臺灣、琉球海域出現四個地名：琉球國、北港、加里林及彭，其中「彭」指現在之澎湖群島，位置明確，無須贅論。琉球國此一概念與大、小琉球有關，一直出現於十六世紀東亞與歐洲的圖籍，本節討論 Selden Map 描繪「琉球國」的意涵。

### （一）琉球國與大、小琉球

「琉球國」這個地名概念淵源自《隋書·流求傳》，被認為是存在於大陸東方海域的國家。十四世紀大明成立初期，沖繩島幾個政治勢力被冊封為「琉球國」某某王，傳統文獻中的流求（琉球）從此有了明確的地理指稱。琉球成為大明重要的朝貢國，藉由朝貢往返，取得中國大陸的商品，經營東亞海域間的貿易，此時期成為琉球歷史學家所說的「大交易時代」。<sup>23</sup> 亦因此故，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初至麻六甲時，即接觸到琉球人，並關注、蒐集有關琉球的風俗民情。

大明與琉球雙方使者往返於福建與沖繩島的那霸港，使節船隻從福建前往琉球時，會經過臺灣北部海域，逐漸出現大、小琉球的概念，大明官員認知臺灣海域也有一「國」，稱為「小琉球」，這是一個政治性、區域性地名，與正統經典知識、官方朝貢活動有關，並附隨於「琉球」概念之下，形成「琉球／琉球群島」、

<sup>23</sup> 高良倉吉，《琉球の時代：大いなる歴史像を求めて》（東京：筑摩書房，2012），第3章。

「小琉球／臺灣」這樣的地理認知。<sup>24</sup> 十六世紀中國圖籍與歐洲文獻、地圖使用大、小琉球的概念，即與此有關。

但大、小琉球的概念在十六世紀中葉，逐漸被取代，因為中國沿海走私貿易興盛，海商、盜匪往來於臺灣海峽，對臺灣島的稱呼也開始改變，如臺灣島北部出現「雞籠」、「淡水」等地名，臺灣南部則有「魷港」、「北港」等；<sup>25</sup> 同時，葡萄牙人往返於澳門、九州各港口之間，對此航路間的島嶼，亦賦與葡萄牙式的地名，如上文所述。對唐人、葡萄牙人而言，大、小琉球這樣的地理概念已不適合用來指稱臺灣與琉球海域。

筆者曾以 Lequeo Pequeño（小琉球）與 Formosa（福爾摩沙）這兩個地名的使用為例，分析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地圖史料裡，兩者先後出現、同時並存，到了 1620 年代地圖裡，Formosa 取代小琉球，成為臺灣島嶼的名稱。<sup>26</sup> 松井洋子彙集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有關 Lequeo 用語的文獻，認為 1620 年代使用 Formosa 取代小琉球（Lequeos Pequeño），亦發現從 1630 年代開始，荷蘭人不再使用大、小琉球的地名概念，而是使用「Lequese Eylanden（琉球島）」來指稱沖繩島。<sup>27</sup> 荷蘭人使用「Lequese Eylanden」，便如同 Selden Map 裡的「琉球國」。不再強調大琉球與小琉球的概念。

這樣的地理認知亦可從琉球王國興衰的脈絡中解讀，Selden Map 中的「琉球國」早已不是十六世紀初貿易興盛的琉球國。十六世紀中葉以後，中國沿海走私貿易盛行後，琉球商人在海域裡無法與唐人、日本人及佛朗機人（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競爭，到了十七世紀初，琉球王國不再是東亞海域主要的貿易勢力。十六世紀末朝鮮戰爭結束後，日本試圖透過琉球，與大明建立外交與貿易關係，1609 年日本薩摩藩入侵琉球，琉球王國成為薩摩藩的附庸，Selden Map 所繪的「琉球

---

<sup>24</sup> 陳宗仁，〈明朝文獻中「雞籠」與「淡水」地名的出現及其背景：兼論十六世紀下半葉北臺海域情勢的轉變〉，收於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主編，《海洋文化論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0），頁 242-246。

<sup>25</sup>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頁 129-185。

<sup>26</sup> 陳宗仁，〈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頁 156-161。

<sup>27</sup> 松井洋子，〈17 世紀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文書に見る Lequeo の情報について〉，收於荒野泰典、濱下武志編，《琉球をめぐる日本・南海の地域間交流史》（東京：文部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重点領域研究「沖繩の歴史情報研究」琉球をめぐる日本・南海の地域間交流史班，1998），頁 121-127。

國」便是此一時期的琉球。對唐人或歐洲各勢力來說，十七世紀初琉球國的重要性僅在於它是前往日本的指標，而不是貿易利益。<sup>28</sup>

1597年西班牙官員 Hernando de los Rios 撰寫臺灣海域情勢的報告給國王，報告中附一幅地圖，描繪範圍包含呂宋、臺灣、琉球及福建、廣東沿岸。圖中稱臺灣島為「ISLA HERMOSA」，臺灣島東北方有三個較大的島嶼，標註「lequios」，註明「Por Aquí se va a Japón（經過這裡前往日本）」，此處的註解亦是表達與上文相同的概念，琉球的價值只是作為前往日本的指標。

## （二）航路的分析

Selden Map 在臺灣、琉球海域畫了一條針路，航線大致是從福州外海航向臺灣島北部，再到琉球國，然後往北轉向日本，最終是到兵庫港。此段針路是：

（福州外海）辰、乙卯、卯、乙卯、卯、乙卯（至琉球國）。子、癸丑、寅及寅（至日本南端外海，轉）艮、壬子、子、丑（至兵庫）。

傳統針路資料的寫法是某一針位經幾更會至某地，如「乙卯針四更船，取黃尾嶼」，但前述資料只有針位。

依筆者所見，十六世紀針路文獻記載福建至日本針路的書籍有《日本圖纂》、《日本一鑑·浮海圖經》、《順風相送》、《四夷廣記》及《使琉球錄》，其中福建至琉球針路的記載與《使琉球錄》最接近。以下比對 Selden Map 以及 1579 年蕭崇業與 1606 年夏子陽兩人所寫《使琉球錄》中的針路資料，發現 Selden Map 所載與蕭崇業之書相當類似，並可依蕭崇業之資料推斷圖中每一航段的更數與航行指標點（即下表第一欄括弧內之內容）。

Selden Map	1579 年蕭崇業〈過海圖〉	1606 年夏子陽〈琉球過海圖〉
辰(推斷航程與指標點:八更,至臺灣北端海域)	梅花頭,正南風,東沙山。用單辰針六更、又用辰異針二更,小琉球頭	梅花頭開洋。過白犬嶼,又取東沙嶼,丁上風,用辰異針八更船,取小琉球山;未上風,乙卯針二更,取雞籠

<sup>28</sup> 1610 年代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度要在那霸設立商館，真榮平房昭認為兩家公司是從商業戰略出發，重視那霸是日本與東南亞航線上的中繼據點，但設置的計畫均未實現，原因是琉球市場有限，加上日本官方的限制，參見真榮平房昭，〈イギリス・オランダ商館の貿易活動と琉球・薩摩：17 世紀初期の動向〉，《史淵》（福岡）125（1988 年 3 月），頁 1-41。

乙卯(四更,至彭佳山)	乙卯針四更船,彭佳山	申酉上風,用甲卯針四更船取彭佳山
卯(十更,至釣魚嶼)	單卯針十更船,取釣魚嶼	亥上風,用乙卯針三更船;未上風,用乙卯針三更船,取花瓶嶼。丁未上風,用乙卯針四更船,取釣魚臺
乙卯(四更,至黃尾嶼)	又用乙卯針四更船,取黃尾嶼	丙午上風,用乙卯針四更船,取黃尾嶼
卯(十更,至古米嶼)	又用單卯針五更船,取赤嶼	丙上風,用乙卯針七更船;丁上風,用辰巽針一更船,取粘米山
	用單卯針伍更船取粘米山	
乙卯(六更,至馬齒山)	又乙卯六更船取馬齒山, <sup>29</sup> 直至琉球,大吉	辰巽針六更,取土那奇翁居里山;又辰巽針一更船,至馬齒山,直到琉球至那霸港

資料來源：蕭崇業、謝杰，《使琉球錄》，頁 11-16；夏子陽、王士楨編，《使琉球錄》，收於黃潤華、薛英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上册，頁 325-338。

根據上述資料之比對可以瞭解，Selden Map 所載針路與 1579 年蕭崇業〈過海圖〉類似，繪者也許是參考蕭崇業的記載，亦可能引述類似之針路資料，但可以確定的是，這類針路資料出自福建水手的實際航海紀錄。《使琉球錄》並未記載琉球與日本之間的針路，以下引用《順風相送》、《四夷廣記》之針路比對如下：

Selden Map	《順風相送》琉球往日本針路	《四夷廣記》漳州往琉球並日本針位
子	單子四更取椅山外過	用單子針，四更船取椅山
癸丑	用癸針二更半取葉壁。單癸四更取流橫山。用丑癸五更取田家地山。用丑癸三更半取夢加利山。單癸三更取大羅山。單癸二更半取萬者通七坵山邊過	用單癸，三更船取葉礁山。用單癸，四更船取硫磺山。用丑癸，五更船取田佳地山。用丑癸，三更半船取度加刺山。用單癸及丑癸，三更船取大羅山。用單癸針，三更半船取萬者通七島山，兩邊過船
寅及良寅	單寅五更取野故山內過	單寅針，五更船取野故山內過
良	良針二更半取但尔山。又良針四更取野甫利山，平港口，流水望東十分急。離野甫里山單寅十更取啞慈子里美山妙，佳眉山，單癸三更	用良寅針，二更半船取旦尔山。用良寅，四更船取亞甫山，平港口。其水東流，十分緊。用單寅，十更船取亞慈子里，美哉其山。或不見山，用單癸針，三更船
壬子	單子一更取而麻山邊，一個沉礁，名做長礁，東邊過船。單丑一更船是正路	用單子針，一更船取而是麻山。南邊有一沉礁，名佐長礁。東北邊過船，用單丑一更是正路
子	子針三更取大山門中傍西邊門過船	
丑	單丑三更取兵庫港為妙	用單丑，四更船平兵庫港，為妙也

資料來源：佚名，《順風相送》，收於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97；慎懋賞，《四夷廣記（中冊）》，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輯，《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該館，1985），頁 14-17。

Selden Map 所繪琉球至日本針路與《順風相送》、《四夷廣記》相比，雖然針路方位類似，但相當簡略。

<sup>29</sup> 指慶良間諸島。

綜上所述，Selden Map 所繪針路是指從福州外海，經臺灣、琉球，至日本兵庫港的針路，而非返程路線。與一般的針路資料相比，也比較簡略，並不足以作為實際導航使用。其次，Selden Map 在福建、澎湖及臺灣之間並沒有針路描繪，對此圖繪者來講，似乎不關注這一針路，如同對臺灣島港口的描繪，與日本、菲律賓群島相比，數量上少了很多。另外，圖裡福建前往呂宋島的航線亦未經過臺灣沿岸。這些現象均說明 Selden Map 繪者並不太關注臺灣、琉球本身，這些海域只是福建船隻前往日本的必經之地而已。

另外，在前述針路裡，針路與所繪圖形沒有對應關係，因為按照一般針路圖的畫法，圖中每一針位的轉折點都應該畫上航行指標點（島嶼），如小琉球頭（臺灣島北端）、釣魚嶼之類，但實際上，Selden Map 所繪臺灣、琉球海域的島嶼位置與針路無關。有學者認為 Selden Map 在臺灣島北部畫出八個小島，可以指明是花瓶嶼、棉花嶼、彭佳嶼、釣魚臺、南小島、北小島、黃尾嶼、赤尾嶼，以及臺灣東側的龜山島。<sup>30</sup> 這樣的看法是認為此圖所畫島嶼與實際地理相符，但此圖之針路描繪就與上述說法不符。臺灣、琉球之間的海域畫法應與日本圖形相同，都是受到十六世紀葡萄牙地圖畫法的影響。總之，Selden Map 有關臺灣、琉球海域的描繪是在十六世紀歐洲所繪地圖裡，加上福建水手的針路資料與地名，是兩種地理知識的拼湊與整合。

## 五、臺灣西岸航路結點：北港

Selden Map 描繪日本時，其圖形受 Mercator 型地圖的影響，但是圖中數十個地名並未依循 Mercator 型地圖，而是使用中國圖籍與福建海商、水手的地理訊息。同樣的模式亦見於 Selden Map 對臺灣、琉球海域的描繪。在臺灣海域的部分，如果依循歐洲地圖，應該標註為 Lequeo Pequeño（小琉球）或 Formosa 島，但 Selden Map 繪者在臺灣海域標註「北港」與「加里林」兩個地名（圖十一），同樣是使用福建海商、水手的地理知識。但為何是「北港」與「加里林」出現於圖中？是繪者任意、偶然的選擇，還是這兩個地名在當時的臺灣海域有著什麼特殊性？

<sup>30</sup> 周运中，〈牛津明末閩商航海图的中国南海与东海〉，收於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編，《丝路的延伸：亚洲海洋历史与文化》（上海：中西书局，2015），頁 220-223。



圖十一 Selden Map 臺灣海域局部

說明：臺灣島原本畫得較大，但島的右下方用顏料塗抹掉一些區域，包括一個圓圈。臺灣島上有兩座山，其旁分別標註「北港」與「加里林」，此種作法亦可能表示這是兩個島嶼。

資料來源：“Selden Map”，館藏編號：MS. Selden supra 105，下載日期：2020年6月10日，網址：<https://bit.ly/3kkFXuz>。

十六世紀文獻中最早有關北港的記載應是《順風相送》，在「松浦往呂宋」針路中載：

用丁未二更，見小琉球雞籠頭山，巡山使上，用丙午六更見北港、沙馬頭大灣山。<sup>31</sup>

此一針路說明帆船從日本航向呂宋島，途中會望見臺灣北端的雞籠，再沿著臺灣西海岸南行（即巡山使上），會見到「北港」。《順風相送》是航海人使用的針路簿，目前所見版本應是1570年代以後的作品，全書有關北港的記載雖然只有一處，卻說明「北港」一語出現於十六世紀下半葉，甚至在1570年代以前，已成為福建航海人的導航用語。

筆者論文〈「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討論北港此一地名概念在十六世紀下半葉到十七世紀的變化。北港海域（臺灣西南海域）最初是福建人重要的漁場，同時福建、日本商人前來收購鹿皮，與呂宋、柬埔寨、暹羅等地一樣，成為

<sup>31</sup> 佚名，《順風相送》，頁91。

日本鹿皮供應地之一。到了十七世紀初，特別是 1610 年代，北港的角色逐漸轉變，福建、日本商人開始在北港進行絲銀貿易，使得北港在十七世紀初期成為臺灣海域重要的貿易地點，受到唐人、日本人、西班牙人及荷蘭人的重視，這是北港貿易的極盛期。1610、1620 年代大明官方文獻屢屢提到海賊盤踞北港，即是此一現象的反映，而官方所謂的北港奸民、巨賊恐怕都是進行走私的商人。1620 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認為他們佔領的福爾摩沙島就是唐人所說的北港，北港成為臺灣全島的名稱。「北港」一詞出現於十六世紀下半葉、廣泛使用於十七世紀上半葉，而於十七世紀下半葉逐漸被「大員（臺灣）」所取代而被淡忘，此一過程反映了臺灣西南沿岸捲入東亞海域貿易的經過。<sup>32</sup>

北港在很多文獻裡都是區域性的地名概念，但最初它可能是指一處唐人停泊的港灣。「北港」究竟指什麼地方？為何稱為「北港」？學者們對上述問題的看法頗為歧異，大致可歸納為四種見解：(1) 北港指雞籠、淡水；<sup>33</sup> (2) 北港即今雲林之北港；<sup>34</sup> (3) 北港是蚊港、魷港；<sup>35</sup> (4) 北港是大員港。<sup>36</sup> 筆者 2003 年在前述〈「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一文時，認為北港位置與魷港有關，當時依據的史料只有《指南正法》所載：「蚊港亦叫臺灣，係是北港」。<sup>37</sup>

這幾年又見到兩條史料與北港有關：

1.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收藏的〈福建海防圖〉，此圖繪於 1616 年福建倭警頻傳之時，當時村山等安派船出征高砂國的傳聞，迫使福建官方加強沿海武備。這幅地圖也是首幅詳細描繪臺灣西海岸各港口的地圖。<sup>38</sup> 在這幅地圖裡，臺灣島被畫成很多的小島，在馬沙港、加老灣等「島」北方，有一些「島」，由北而南分別是

<sup>32</sup> 詳細論證參見陳宗仁，〈「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臺北）21:2（2003 年 12 月），頁 249-278。

<sup>33</sup>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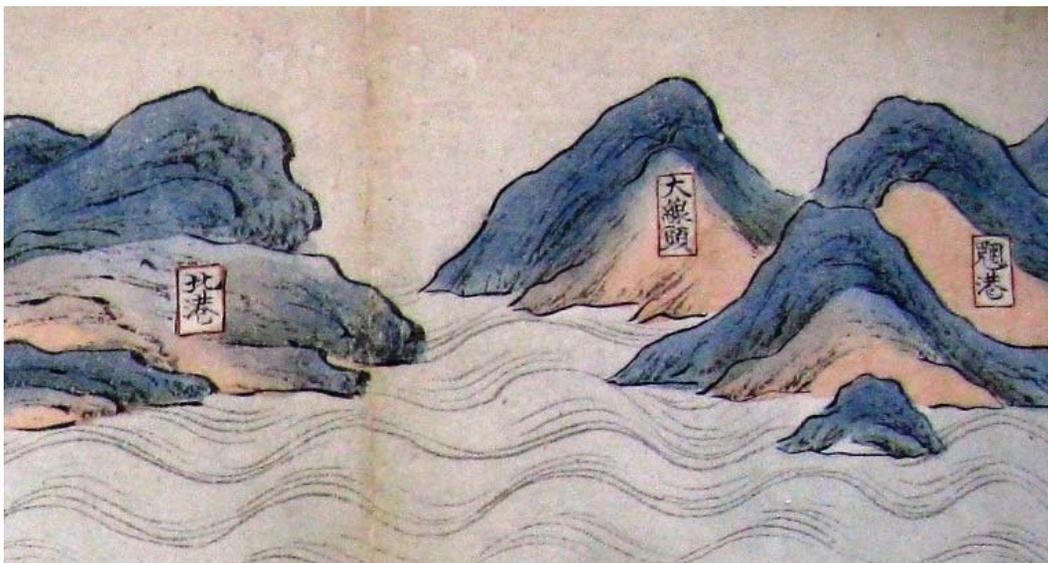
<sup>34</sup> 連橫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雅堂文集》（文叢第 208 種，1964），卷 3：臺灣史跡志，「北港」條，頁 206。

<sup>35</sup>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頁 218。

<sup>36</sup> 原文為：「北港即澎湖之唇齒，失北港則唇亡而齒寒……北港蓋在澎湖之東南，亦謂之臺灣」，參見顧祖禹著，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99，「澎湖」條，頁 4518。

<sup>37</sup> 佚名，《指南正法》，收於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頁 137。

<sup>38</sup> 陳第《東番記》記載 10 個臺灣地名，而〈福建海防圖〉收錄了 20 個地名，有關該圖的研究，可參見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頁 1-42。



圖十二 〈福建海防圖〉局部

資料來源：孫靖國，《輿圖指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頁330。

二林、灣頭、小漁嶼、北港、大線頭、魁港（圖十二）。這是目前所知各種地圖史料中惟一標註北港位置的地圖。<sup>39</sup>

2. 大英圖書館藏收藏一份道教科儀，1769年抄本，作者不詳，其中紀錄往西洋、往東洋、下南、上北四航線。在東洋的航線中，提到一些臺灣港口，其文載：

澎湖（暗灣）打狗也 雞籠（善招也）淡水（善招也）郊里臨（善招也）北港（善招也）蚊港（善招也）沙馬頭大港。<sup>40</sup>

文中有北港，置於郊里臨與蚊港之間。這份科儀敘述地名的先後是否是按照地理方位依序排列？就整個東洋航線的敘述內容來看，從漳州的本港澳（可能指月港）開始，接著敘述廈門灣的港澳，再到臺灣、菲律賓，一直至汶萊，大致仍按地理位置記載。至於臺灣港澳的敘述，依澎湖、打狗及雞籠三港相鄰來看，這顯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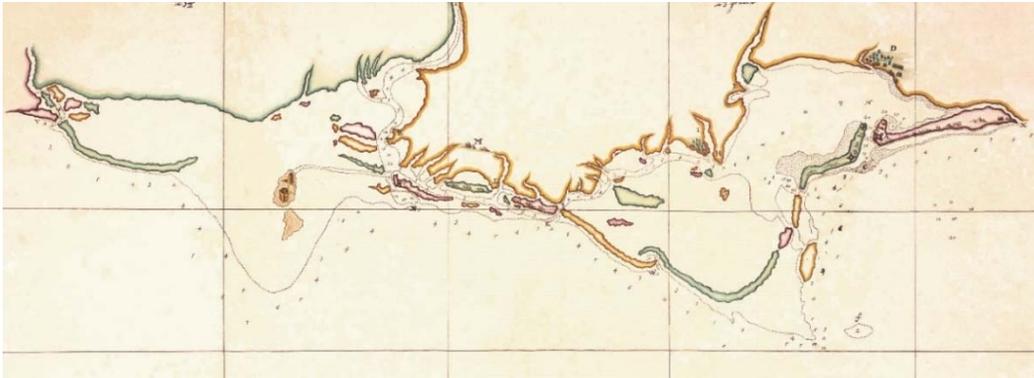
<sup>39</sup> 荷蘭東印度公司有幾幅臺灣島圖標註 Packan（北港），不過圖中 Packan 是指 Formosa 島，屬於區域性的概念，而非港口或港道。參見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臺北：漢聲出版社，1997），上冊，頁84、89、92。

<sup>40</sup> 大英圖書館典藏編號 OR12693/18。轉引自陳佳榮、朱鑿秋執行主編，《中國歷代海路針經》（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6），下冊，頁869。

是按地理位置排列，但整體而言，從雞籠以後似乎是由北而南依序敘述。因此，北港並非魷港，而且在蚊港之北，此一敘述與〈福建海防圖〉相同。

北港究竟在什麼位置？也許十七世紀臺灣西南海域的自然環境可以提供一些參考。當時臺灣西南海域有兩處潟湖（唐人稱為「內海仔」），被佳里半島隔開。<sup>41</sup> 半島南側是臺江內海，即十七世紀福建文獻所稱的大員（大灣、臺員），意指大海灣，依照 1630 年代荷蘭測繪的地圖（圖十三），臺江內海（地圖右側水域）西端已被沙洲包圍；半島北側的水域位在十八世紀「倒風內海」以北、經過魷港，延伸到笨港溪口，即前述荷蘭地圖左側水域，水域下方（西方）沙洲或浮出水面，或尚在水底，筆者統稱之為「古魷港內海」。現今這片水域已淤淺成陸，部分尚為魚塭與鹽田。

前述荷蘭地圖關注的是適航水道與危險水域的水深，使用荷蘭人的地名稱呼，故無法得知〈福建海防圖〉所載唐人地名的位置。〈福建海防圖〉所載「馬沙港」又稱「馬沙溝」，位在今臺南市將軍區的長沙里、平沙里，將軍溪出海口南側；<sup>42</sup>



圖十三 〈手繪臺灣西海岸海圖〉(局部)

資料來源：魏德文、賴志彰編，《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8），圖 I.10。

<sup>41</sup> 佳里半島或三角洲為古曾文溪泥沙堆積而成，將臺灣西南沿岸之潟湖分割為倒風與臺江兩內海。參見張瑞津、石再添、陳翰霖，〈臺灣西南部嘉南海岸平原河道變遷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報告》（臺北）27（1997年11月），頁126。按臺江內海之南，當時尚有一些潟湖（如堯港、打狗），與本文無關，故未列入討論。

<sup>42</sup> 盧嘉興，〈臺南縣古地名考〉，收於臺南縣政府民政局編校，《輿地纂要》（臺南：臺南縣政府，1981），頁39；林聖欽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7：臺南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2），頁672-673。

「加老灣」位在馬沙溝南側，約在今曾文溪以北，七股區西南側。<sup>43</sup> 這兩地是當時唐船停泊港，位在臺江內海北側的沙洲。

另有「大線頭」，在十七世紀上半葉文獻中似僅見〈福建海防圖〉記載，在十七世紀下半葉文獻中，《臺灣外記》記載通事何斌所乘船隻在鹿耳門沉沒，何斌漂至大線頭被救起，<sup>44</sup> 此一史事說明大線頭離鹿耳門不遠。1710年代《諸羅縣志》亦載：「大線頭昔為大澳，舟出外洋，於此候風」。<sup>45</sup> 此文所謂出洋之舟乃指從臺江內海出外洋，可見大線頭與臺江內海有關。

1610年代〈福建海防圖〉的大線頭是唐人船隻往來的港澳，而1680年代文獻所載大線頭亦是大澳，同樣都是港澳概念。筆者認為這兩個地名應該同指一地，其位置在臺江內海北側，界於馬沙港與魷港之間。但其位置也相當接近魷港，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的〈康熙臺灣輿圖〉裡，繪有蚊港汛、大線頭，大線頭位置在南方，但大線頭的文字標註：「本汛東至蚊港汛，水道壹更」，意即大線頭在蚊港汛之西側。故〈福建海防圖〉將大線頭繪於魷港之北，應為誤繪，但兩者位置十分接近，海上船隻接近臺灣陸地時，應當先見到大線頭，然後才是蚊港（魷港），可能因此之故，〈福建海防圖〉才將大線頭繪於魷港之北。

根據以上所述，從地形的角度看，〈福建海防圖〉所載北港與魷港應同位於古魷港內海，北方是笨港內海。北港本為內海港澳，後來才演變為臺灣島的名稱。故北港的位置不會如某些學者所說，在臺江內海東南側的赤崁，<sup>46</sup> 也不會在雲林縣北港鎮到嘉義縣六腳鄉一帶，<sup>47</sup> 因為北港鎮在北港溪北岸，六腳鄉在南岸，都屬北港河流域，此一區域屬於十七世紀文獻中所謂的「笨港」。

至於北港為何稱為「北」港？在162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所繪地圖裡，臺江

<sup>43</sup> 盧嘉興，〈曾文溪與國賽港〉，收於臺南縣政府民政局編校，《輿地纂要》，頁71-74。

<sup>44</sup> 江日昇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外記》（文叢第60種，1960；1704年原刊），卷2，頁47載：「適通事何斌同李英在澎湖被李魁奇追趕，船隻走到鹿耳門打破（鹿耳門，臺灣口子），兩船人咸淹死，僅存何斌與一二水手，被水漂至大線頭救起」。又江日昇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外記》，卷6，頁234載：「何祐帶一旅守大線頭」。

<sup>45</sup> 周鍾瑄主修、陳夢林總纂，《諸羅縣志》（文叢第141種，1962；1717年原刊），頁287。

<sup>46</sup> 徐曉望，〈論明代北港的崛起〉，收於徐曉望，《早期台灣史考證》（福州：海風出版社，2014），頁154-155。

<sup>47</sup> 周運中，《正說台灣古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頁239-240。

內海北方有一海灣，在一條河流出海口兩岸，分別標註 wamkan 與 lankam，<sup>48</sup> 前者是魷港，後者讀音接近南港。康培德研究十七世紀臺灣西南海岸的唐人地名時，指出 1650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有一處出贖的漁場稱為 Lamkam，位在魷港之旁，應為「南港」，作為北港的對應地名。<sup>49</sup> 也許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時，古魷港內海存在著北港與南港。

本小節一開始提到十六世紀的文獻中已記載魷港與北港，但是關於臺江內海港口的描述，記載較少，<sup>50</sup> 加老灣、大員等地名似乎始見於十七世紀初陳第的〈東番記〉。此種差異應該不是兩地原住民社會經濟差異所造成，而是與福建人前來臺灣西南海域的航道有關。1610 年代張燮《東西洋考》載：「東番：人稱為小東洋，從澎湖一日夜至魷港」，<sup>51</sup> 前引《指南正法》亦載：

澎湖暗澳有媽祖宮，山無尖峰，嶼多。乙辰五更取蚊港，蚊港亦叫臺灣，係是北港。身上去淡水，上是圭籠頭。下打狗子，(打狗子)西北有灣，看石佛不可拋船；(打狗子)東南邊亦灣，東去有淡水，亦名放索番子。<sup>52</sup>

這兩段航路資料均記載從澎湖到臺灣，會先到魷港(蚊港)。<sup>53</sup> 《指南正法》的針路更提到船隻航至蚊港後，可以往上至淡水，再至圭籠頭(雞籠頭)；亦可從蚊港

<sup>48</sup> 冉福立 (Kees Zandvliet) 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頁 14、128。按此圖 *Affteyckeninghe van de Baye van Tayuwan enz. (Kaart van de baai van Tayuwan)* 為 1623 年 Moses Claesz Comans 所繪，圖中「lankam」，筆者原先認為是 pankam，審查人認為此字亦有學者主張是 lankam，經檢視此字書寫筆順，應是 lankam。謹向審查人致謝。又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333 寫作「Lamcam」。

<sup>49</sup> 康培德，〈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下南瀛及周遭地區的漢語地名〉，收於劉益昌、賀安娟 (Ann Heylen) 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V：早期南瀛》(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9)，頁 86。

<sup>50</sup> 1574 年劉堯誨奏疏曾提到新港、麻荳。參見湯開建，〈明隆万之際粵東巨盜林凤事迹詳考：以刘尧诲《督抚疏议》中林凤史料为中心〉，《历史研究》(北京) 2012: 6 (2012 年 12 月)，頁 52。

<sup>51</sup>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 185。

<sup>52</sup> 佚名，《指南正法》，頁 137。文中「石佛」為海中之石，據李丕煜主修、陳文達編纂，《鳳山縣志》(文叢第 124 種，1961；1719 年原刊)，頁 5 載：「隔海參差、遠近浮沉而列於打鼓山之左右者，西有石佛(大石屹立于海中，形似佛，故名。舟經此，鳴金鼓以獻紙)……皆石生海中，而以形名者」。可以參見許世旻，〈初探清領時期的地理位置觀念：以「石佛凌波」為分析的對象〉，《史穗》(臺南) 10 (2019 年 11 月)，頁 21-69。感謝吳佩璇同學提供此一訊息。

<sup>53</sup> 陳第〈東番記〉記載另一段航路，謂：「野史氏曰：異哉東番！從烈嶼諸澳乘北風航海，一晝夜至澎湖，又一晝夜至加老灣，近矣」。亦即從澎湖航往加老灣，加老灣位在臺江內海北側，不過其北方即古魷港內海。參見陳第，〈東番記〉，收於沈有容等輯，《閩海贈言》(文叢第 56 種，1959)，頁 27。

往下至打狗子。從地理形勢看，古魷港內海在澎湖群島的正東方，澎湖至此，距離最近，又因潟湖地形，容易有港澳停泊。可能因此之故，使得古魷港內海成為十六世紀福建漁民、商人最早熟悉的區域，遂出現了魷港與北港等地名。

Selden Map 約繪於 1610 年代，當時繪者在臺灣海域標上「北港」地名，應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因為這是當時臺灣海域最重要的港口，重要的原因除了良好的停泊條件外，它也是臺灣西岸航線的結點。筆者在分析〈福建海防圖〉時，曾指出此圖在臺灣海域描繪很多小島，成群排列於福建外海，形象地呈現「東番諸山」的想法，而每一個島均是一個港口，「東番諸山」即是東番諸港之意。圖中臺灣西海岸共有 20 個地名，其中 16 個地名與「港」、「水」、「山」、「頭」有關，這些均是福建航海者的慣用語，顯示這些地點均是福建航海者行走的港口。<sup>54</sup> 但福建船隻如何抵達這些港口？依據本節的分析，渡海船隻若是經由澎湖來至臺灣沿岸，應是先到古魷港內海的北港、魷港，由此往北到雞籠、淡水，往南到打狗、放索。

1620 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大員後，建構以大員為中心的航路網絡，<sup>55</sup> 北港作為福建與臺灣西岸航線結點可能因此而告終。

## 六、直航臺灣西北海岸的指標：加里林

Selden Map 在北港之南標註了另一個地名「加里林」。此一地名不如北港、魷港有名，文獻記載的不多，分述如下：

### 1. 十七世紀初陳第〈東番記〉中載：

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起魷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凡千餘里……<sup>56</sup>

文中有「加哩林」。陳第於 1603 年初隨著沈有容來臺勦倭，事後將此段見聞寫成

<sup>54</sup> 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頁 1-42。

<sup>55</sup> 康培德，〈荷蘭時代臺灣各港之間的貿易變遷〉，收於黃富三編，《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 15-39。

<sup>56</sup> 陳第，〈東番記〉，頁 24。

〈東番記〉，學者們對文中十個地名與現代位置的比定，有不同的看法，對加哩林的位置也有爭議，以下會再討論。另外，陳第在〈舟師客問〉一文中提到沈有容曾「私募漁人，直至東番，圖其地里，乃知澎湖以東，上自魴港、下至加哩，往往有嶼可泊」，文中之「加哩」是加里林嗎？下文亦會討論。

## 2. 前引張燮《東西洋考》載：

東番：人稱為小東洋，從澎湖一日夜至魴港；又一日夜為打狗；又用辰巽針，十五更取交里林，以達雞籠、淡水。<sup>57</sup>

此文提到「交里林」，應是加里林的另一種寫法。但此文對航路的敘述方式稍嫌含混，容易解讀為由澎湖至魴港需一日夜，然後再一日夜至打狗，再由打狗至交里林，最後抵雞籠、淡水。但若由打狗循著臺灣西海岸北上，應該使用北向、東北向的針位，如艮寅，而非東南向的辰巽針位，所以《東西洋考》此段記載不應如此解讀。

依張燮之意，船隻至澎湖後，可以分別前往臺灣島的魴港、打狗及交里林（最終至雞籠、淡水）。其中澎湖往東航向古魴港內海的魴港，或者往東南到打狗，航程各需一日一夜（即十更）。至於澎湖至臺灣北部的雞籠、淡水，則是用東南偏東的針位（辰巽針，127.5度）先往交里林，再北上至雞籠、淡水；張燮記載此條針路需時十五更，應指澎湖至雞籠、淡水的航程，而不是澎湖至加里林。因此，依張燮所述，交里林位在澎湖前往雞籠的航程中，其位置必然在魴港之北。

## 3. 周嬰〈東番記〉載：

其地為起蟒巷、打狗嶼、小淡水、大封坑、鹿耳門，沙巴里、雙溪口、伽老灣、家里林、台員港。

文中「起蟒巷」似乎被當作是地名，但這應是周嬰誤讀陳第之文，「起」字在陳第之文中是開始之意，蟒巷則指魴港，巷字為港字之誤；大封坑即大幫坑、家里林即加里林、伽老灣即加老灣、臺員即大員。此段文字與陳第之文比對，兩者均提及東番十個地名，但較陳第之文少了堯港，多了鹿耳門，另外是名稱寫法略異，

<sup>57</sup>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185。

排列順序不同。李祖基認為周嬰若是抄錄自陳第之文，何以改易字形與順序，他認為周嬰所載「另有所本」，<sup>58</sup> 不過也可能是周嬰參考陳第之文，再摻以己見，略作更動，才會將魷港誤寫作「起蟒港」。

周嬰將家里林置於加老灣與台員港之間，若其排列順序是按照地理位置，則加里林應位於臺江內海，不過周嬰上述地名應未按方位排列，故不能如此推論。

4. 1680 年代大清國佔領臺灣後，吏部侍郎杜臻奉派巡視閩粵等地，他撰寫《粵閩巡視紀略》記載巡視經過。杜臻沒有來臺勘察，而是根據文獻敘述臺灣情形，其中引用陳第之〈東番記〉，略改其文意，謂：

其地起魷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又有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sup>59</sup>

又據新繪之臺灣地圖，謂：

自新港社西南五十里至麻豆社。水西出，曰莽港，即陳第所謂魷港也，其旁有茄哩嶼、雙溪口，皆第記所有，自此以北，第不及知矣。<sup>60</sup>

杜臻的解讀與陳第原文相比，即在「雙溪口」之前，增加「又有」兩字。另一段敘述則是比對陳第所載地名與杜臻所持地圖，認為地圖中的莽港即魷港。至於將新繪臺灣地圖中的「茄哩嶼」，解讀為陳第的「加哩林」，並認為在魷港之旁，這一比對則有點問題。杜臻自謂是依據「新繪」地圖，這是什麼樣的地圖？二十世紀中葉田中克己認為是鄭氏地圖，<sup>61</sup> 筆者認為杜臻所持地圖與林謙光《臺灣府紀畧》之圖（圖十四）類似，<sup>62</sup> 參考林氏書中之圖，在馬沙溝以北，有蚊港與笨港，但笨港在蚊港之南，顯是誤繪。圖中蚊港附近，可以找到雙溪口、加里興，杜臻可能看到的地圖有加里興，遂認為「興」字是「嶼」字之誤，進而認為加哩林即

<sup>58</sup> 李祖基，〈周嬰〈東番記〉研究〉，《台灣研究集刊》（廈門）79（2003年3月），頁84。

<sup>59</sup>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卷6，頁5b。

<sup>60</sup>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6，頁15b-16a。

<sup>61</sup> 田中克己，〈鄭氏の臺灣地圖〉，收於和田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會編，《東洋史論叢：和田博士還曆記念》（東京：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1951），頁407-418。

<sup>62</sup> 關於杜臻所見地圖與林謙光著作之關係，筆者另文考證此事，未刊稿。



十六、十七世紀的航路狀況。<sup>66</sup> 這些應都是十七世紀時的文獻。

再就文本形成的脈絡來看，陳第曾隨浯嶼把總沈有容來臺，在大員近二十日，可能無法靠親身經歷得知臺灣沿海港口，陳第在〈舟師客問〉一文中提到沈有容曾「私募漁人，直至東番，圖其地里，乃知澎湖以東，上自魷港、下至加哩，往往有嶼可泊」，可見陳第〈東番記〉中的地名應是來自沈有容的調查，而沈有容的資料又來自私募漁人，即在臺灣沿海捕魚的福建漁夫。張燮所載針路，也是得自漁民與海商。周嬰參考陳第之文，但他於1625年「從車游擊料兵于海」，<sup>67</sup> 與陳第相同，亦可見到海防將領的調查資料。1769年的科儀文字應是源於針路資料，這些均是實際航海者的見聞。至於杜臻巡視福建，他搜集與臺灣有關的文獻資料，包含陳第之文，但杜臻主要是比對陳第所寫臺灣地名與清初之臺灣地圖。

Selden Map 繪製時間約當張燮寫作《東西洋考》之時，圖中所載加里林若置於上述文獻脈絡中，年代大約與陳第、張燮及周嬰的記載相近，都是十七世紀前三十年的文獻。因此，加里林在十七世紀初期數十年間，是福建漁民、海商熟知的地名，再收錄於文人著作或科儀文本裡，Selden Map 即在此一脈絡下標註加里林。

加里林在什麼地方呢？有學者猜想加里林應是加呈林之誤，即呈誤寫作里，進而認為是指今屏東縣東港鎮之茄藤港；<sup>68</sup> 不過，在上述的討論，加里林已有數種文獻記載，只是寫法不同，故是真有其地，而非茄藤林之訛。亦有人認為指蕭壩，<sup>69</sup> 但這亦是猜想之辭。

學者間對加里林的位置有不同的看法，這涉及對陳第〈東番記〉所述十個臺灣地名的位置比定，學者多半認為上述地名的排列是有秩序的，但分布的範圍在那裡，卻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差異是這些地名分布在今臺灣島的西海岸，還是僅局限在臺灣島的西南海岸？

<sup>66</sup> 此科儀雖是十八世紀寫成，但所載四條航線中，東洋與西洋的寫作格式與下南、上北不同，且東洋航線中臺灣海域未見大員，其指涉之年代應在十六、十七世紀。引文見於陳佳榮、朱鑒秋執行主編，《中國歷代海路針經》，下冊，頁867-872。

<sup>67</sup> 周嬰，〈大担屿诗序〉，轉引自李祖基，〈周嬰〈東番記〉研究〉，頁82。

<sup>68</sup> 周運中，〈牛津明末閩商航海圖的中國南海與東海〉，頁215。

<sup>69</sup> Robert Batchelor 認為加里林是稱為加里的森林“Jiali forest or Soulang near the future Fort Zeelandia”，參見 Robert Batchelor, “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A Chinese Map of East Asian Shipping Routes, c.1619,” *Imago Mundi* (London) 65: 1 (Jan. 2013), p. 61, fn. 34.

## 1. 分布於臺灣西海岸

翁佳音對上述地名位置的比定是：

「魷港」是臺南北門區附近，「加老灣」、「大員」是臺南臺江一帶；「堯港、打狗嶼、小淡水」在高雄與屏東境內；「雙溪口」是嘉義朴子鎮內的老地名；「加哩林」可推測為彰化二林，「沙巴里」、「大幫坑」，分別為臺北的淡水河口與大坌坑。

亦即這些地名分布於臺灣北部海岸的淡水到南部的屏東。翁佳音又解釋〈東番記〉所載：「斷續凡千餘里，種類甚蕃」，意指文中「涉及之地點與族群，是泛指全島，非單單指臺南西拉雅一族」。<sup>70</sup> 翁佳音上述看法在近年他發表的其他文章中，或多或少均曾寫過，筆者大都認同。

## 2. 局限於西南海岸

周婉窈引用杜臻的看法，認為陳第原文應理解成：

其起地魷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又有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

亦即前六個地名的排列有先後順序，即從北往南排列，最後四個地名則是「陳第講完東番的南北範圍之後，再回頭提一些主要的地名，而這些地方不必然在小淡水之南」。<sup>71</sup> 另外，他依據陳第所謂「上自魷港、下至加哩」一語，認為加哩在魷港之南，且應為加哩林的省文，並解釋「由於沈有容找人暗中偵查繪圖，目的是要尋找可以停泊船艦的港口，以攻打盤據大員的海寇，因此加哩不當離大員太遠」，又引用盧嘉興之見解，謂加哩林應即是加里興，在今臺南市佳里區。<sup>72</sup>

不過，若是依據上述解讀，會有兩個問題，一是佳里興位在佳里半島，並非沿海港口，十七世紀文獻描述的地名均在沿海，不大可能記載一個稍近內陸的地

<sup>70</sup> 翁佳音，〈釋〈東番記〉中的近代初期番漢關係〉，《原住民族文獻》（臺北）20（2015年4月），頁48-49。

<sup>71</sup> 周婉窈，〈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地區的實地調查報告〉，收於周婉窈，《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128。

<sup>72</sup> 周婉窈，〈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地區的實地調查報告〉，頁130。按盧嘉興此一說法係依據杜臻的記載，參見盧嘉興，〈臺南縣古地名考〉，頁34-35。

名。二是魷港到佳里興之間，並沒有島嶼，不符合「往往有嶼可泊」的描述。故純就陳第文字來看，杜臻的解讀可能不是陳第原意。「加哩」亦有可能是「加老灣」之誤，即魷港至加老灣之間「往往有嶼可泊」，文意較通順。

至於小淡水之後四個地名（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的位置，除了杜臻的解釋之外，筆者認為有另外一種可能性，也就是陳第所述十個地名可分三組，敘述的基準點是魷港、加老灣（即陳第所謂「起魷港、加老灣」），往南是「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等四個聚居地，往北是「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等四處。為什麼是以魷港、加老灣為基準點？因為如上節所述，這兩地是福建船隻來臺最常抵達的港口，所以成為敘述臺灣西部沿岸地名的基準點。

加里林位於魷港之北，如翁佳音、康培德等學者的看法，指的是今彰化縣的二林。二林最早出現於文獻記載，似可追溯至 1570 年代，當時林鳳被大明官軍追擊，從澎湖逃至新港，據當時福建巡撫劉堯誨的奏疏：

舊歲十一月間，林鳳復回新港……海賊林鳳于十一月初二日自新港開去，打劫麻荳番，被棲林等番夾攻，殺賊五百余人，於初七日開遁南去。<sup>73</sup>

翁佳音認為文中「棲林」即指二林。<sup>74</sup> 1610 年代繪製的《福建沿海圖》亦有二林、三林等地名。在康培德有關二林的研究中，指出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大員初期，二林（Girin）是唐人泊船補給之處，此地唐人與原住民會打劫荷蘭船隻，甚至在 1630 年時有二林人乘坐四十艘船攻擊公司的魷港駐地。後來二林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賸社單位與教區，也是重要的港口。<sup>75</sup>

近年鄭維中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在臺灣海峽間的航路，注意到二林對荷蘭船隻航行的重要性。依據荷蘭文獻的記載，魷港以北的海岸分布沙洲，在二林一帶，沙洲從岸邊向海延伸了兩個荷蘭里（15 公里），因此吃水深的船隻很難接

<sup>73</sup> 轉引自湯開建，〈明隆萬之際粵東巨盜林鳳事迹詳考：以劉堯誨《督撫疏議》中林鳳史料為中心〉，頁 52。

<sup>74</sup> 翁佳音，〈臺灣·海濱的地名：地名學視野中的十六、七世紀臺灣史〉，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近現代閩、臺商人的活動與工商業傳承」（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三樓第一會議室，2012 年 6 月 21 日）。

<sup>75</sup> 康培德，〈二林地區：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彰化平原與濁水溪沖積扇北半部人群的地域區劃〉，《白沙歷史地理學報》（彰化）15（2014 年 12 月），頁 21-45。康培德在頁 5 提到：「荷蘭人一開始對二林的認識，其實是透過在當地活動的唐人。唐人對二林的認知，是以船隻出入上岸的『港（káng）』為主體，將當地住民的村社：二林社，附帶於二林『港』」。

近。因此，荷蘭地圖標記二林，並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可以使用的港口，而是因為它是一個航行指標，告訴操舵員前往中國的航路轉折點已經接近。船隻若要至雞籠，必須從二林向中國沿海航行，再折向雞籠。<sup>76</sup> 不過，閩南船隻的特性、出海港澳均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不同，唐人船隻從二林至雞籠、淡水，應仍是「巡山使上」，即導航的依據是臺灣島，沿著臺灣西海岸外海行駛。

加里林位於北港之北，但 Selden Map 將加里林標注於北港南方，應是錯誤的地理認知，這種錯誤亦出現於日本圖形裡多處地名標註。<sup>77</sup> 這類現象顯示繪者對於臺灣、日本海域的港市位置並不熟悉，他可能不是親身經歷這些海域，而是根據各種圖籍繪製 Selden Map。

總之，從十七世紀上半葉的文獻來看，加里林指的是濁水溪沖積扇的二林，其重要性在於它是十七世紀臺灣中部地區主要的港口，一如十八、十九世紀的鹿港，此外，對當時臺灣沿岸航線而言，它也是重要的航行指標點，閩南船隻到了澎湖，若要前往雞籠、淡水時，可以選擇直航二林，再往北。

## 七、結論

本文分析 Selden Map 有關臺灣、琉球海域的描繪，分別針對圖形、文字標註及針路討論。

關於圖形，此一時期中國、日本及歐洲地圖對於臺灣、琉球海域的描繪，都認為這個區域有很多島嶼，但是畫法並不相同，中國地圖的繪圖概念是圖形受制於文字文本，先有一個島嶼的地名概念，再畫一個島嶼圖形，但是歐洲地圖描繪很多島嶼，但不一定有相對的島嶼名稱，從這個角度來看，Selden Map 的畫法是屬於歐洲式而不是中國式。

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世界、東亞地圖均依據葡萄牙人的地理知識。1540 年代開始，葡萄牙人往返於澳門、日本之間，他們學習唐人的航海知識，也累積對這

<sup>76</sup> Weichung Cheng, "Sailing from the China Coast to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Dutch Sailing Pattern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aris) 101 (2015), pp. 319-322.

<sup>77</sup> Selden Map 日本圖形裡，本州與九州的地名同繪於一島，本州東側大阪灣沿岸的「沙堦（堺）」繪於島嶼西側，將大阪灣沿岸的「溫子米（和泉）」繪於內陸，這些均是港市誤置的例子。

段航程中的認識，「發現」某些島嶼，賦與葡萄牙式的名稱，如 Formosa。因此，在葡萄牙的海圖裡，他們吸收了福建人的大、小琉球概念，再加上葡萄牙水手「新發現」的島嶼，構成幾種類型的描繪方式，Selden Map 有關臺灣、琉球的圖形屬於 Mercator 型地圖的繪法。

地名的部分，對於琉球的描寫，只有標註「琉球國」，在臺灣也只有兩個地名：「北港」與「加里林」；至於航路，則標註了福建經臺灣、琉球，前往日本的航路，但沒有描繪前往臺灣西海岸的航路。與 Selden Map 其他部分的圖形相比，相當簡略，換言之，臺灣與琉球都不是繪者關注的重點，但關於臺灣、琉球海域的地名與航路均受到福建水手的海域知識影響。

換言之，Selden Map 有關臺灣、琉球的描繪，和對日本海域的描繪方式相同，均是在十六世紀葡萄牙海圖的基礎上，加上福建人（唐人）的海域知識。

本文另一重點是討論琉球國、北港及加里林的意涵。從歷史脈絡的角度來看，臺灣與琉球兩地所載地名相當簡略，但各自代表著不同的歷史意義。十七世紀初的琉球國淡出了東亞海域的貿易活動，具體的歷史事件是 1609 年琉球國成為薩摩藩的附庸。此時的「琉球國」只是前往日本路程中的航行指標，琉球的「大交易時代」業已結束。

Selden Map 繪者在臺灣海域標註「北港」與「加里林」這兩個地名，也許只是偶然摘錄，但若從十七世紀初的臺灣歷史來看，這兩個港口卻有其重要性。本文根據史料，討論這兩個地名的實際位置，認為北港應該在古魷港內海內，加里林則是彰化的二林，Selden Map 將加里林置於北港之南，應是誤繪。這兩個地名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最初是臺灣西岸眾多港口之一，但是在唐人沿著臺灣西海岸捕魚、經商的過程中，逐漸突顯這兩個港口的特殊性：北港所在的古魷港內海，是福建船隻從澎湖抵達臺灣最近的海域，北港成為福建商船經澎湖前往臺灣西岸各港口的結點；至於加里林則是福建船隻從澎湖直航臺灣中、北部海域的航行指標。北港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在十七世紀初期，受到東亞各股勢力的重視，大明國的福建官員、日本、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西班牙王國關注臺灣週遭海域的情勢變化，均注意到臺灣海域的「北港」，使得北港從港口變成是臺灣島的名稱。不過，1620 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大員，「北港」的角色遂被「大員」取代，而漸遭遺忘。二林亦因沙洲陸化，失去港口功能而於十八世紀為鹿港取代。

## 引用書目

“Selden Map”，典藏於英國牛津大學 Bodleian 圖書館，館藏編號：MS. Selden supra 105，下載日期：2020年6月10日，網址：<https://bit.ly/3kkFXuz>。

中村拓

1966 《鎖国前に南蛮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図 I》。東京：東洋文庫。

1967 《鎖国前に南蛮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図 III》。東京：東洋文庫。

冉福立 (Zandvliet, Kees) (著)、江樹生 (譯)

1997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臺北：漢聲出版社。

田中克己

1951 〈鄭氏の臺灣地圖〉，收於和田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會編，《東洋史論叢：和田博士還曆記念》，頁 407-422。東京：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

田中健夫

1997 〈《海東諸国紀》の日本、琉球国：その東アジア史的意義と南波本の紹介〉，收於田中健夫，《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国際認識》，頁 102-147。東京：吉川弘文館。

申叔舟 (著)、田中健夫 (譯注)

1991 《海東諸国紀：朝鮮人の見た中世の日本と琉球》。東京：岩波書店。

朱思本 (原圖)，羅洪先、胡松 (增補)

1997 《廣輿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江日昇 (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編)

1960[1704] 《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汤开建

2012 〈明隆万之际粤东巨盗林凤事迹详考：以刘尧诲《督抚疏议》中林凤史料为中心〉，《历史研究》(北京) 2012(6): 43-65。

佚名

2000 《指南正法》，收於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

2000 《順風相送》，收於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

张丽玲

2016 〈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评述〉，《海洋史研究》(北京) 9: 377-393。

李 賢等 (撰)

1990 《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

李丕煜 (主修)、陳文達 (編纂)

1961[1719] 《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李祖基

2003 〈周嬰〈东番记〉研究〉，《台湾研究集刊》(廈門) 79: 72-84。

杜 臻

1983 《粵閩巡視紀略》。臺北：文海出版社。

楊雨蕾、鄭晨

2018 〈多元的認識：韓國古輿圖中的琉球形象〉，《海交史研究》（泉州）2018(2): 40-56。

周運中

2015 〈牛津明末閩商航海圖的中國南海與東海〉，收於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編，《絲路的延伸：亞洲海洋歷史與文化》，頁 212-229。上海：中西書局。

2016 《正說台灣古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周婉窈

2012 〈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地區的實地調查報告〉，收於周婉窈，《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頁 107-15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井洋子

1998 〈17世紀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文書に見る Lequeo の情報について〉，收於荒野泰典、濱下武志編，《琉球をめぐる日本・南海の地域間交流史》，頁 121-127。東京：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重點領域研究「沖繩の歷史情報研究」琉球をめぐる日本・南海の地域間交流史班。

林聖欽等（撰述）

2002 《臺灣地名辭書·卷7：臺南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林謙光

1996 《臺灣府紀畧》。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金國平（金国平）

2000 《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

2018 〈從葡萄牙語及琉球漢語文獻論析 Cheilat 之生平與事迹〉，收於金國平，《澳門學：探賾與匯知》，頁 26-55。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秋岡武次郎

1997 《日本地圖史》。東京：有限会社ミュージアム図書。

夏子陽、王士楨（編）

2000 《使琉球錄》，收於黃潤華、薛英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上冊，頁 325-338。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孫靖國

2012 《輿圖指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宮紀子

2007 《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

徐曉望

2014 〈論明代北港的崛起〉，收於徐曉望，《早期台灣史考證》，頁 151-173。福州：海風出版社。

2019 〈論明萬曆二年福建水師的台灣新港之戰〉，《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福州）2019(11): 109-115。

真柴平房昭

1988 〈イギリス・オランダ商館の貿易活動と琉球・薩摩：17世紀初期の動向〉，《史淵》（福岡）125: 1-41。

翁佳音

2012 〈臺灣・海濱的地名：地名學視野中的十六、七世紀臺灣史〉，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近現代閩、臺商人的活動與工商業傳承」。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三樓第一會議室，6月21日。

2015 〈釋〈東番記〉中的近代初期番漢關係〉，《原住民族文獻》（臺北）20: 47-53。

高良倉吉

2012 《琉球の時代：大いなる歴史像を求めて》。東京：筑摩書房。

康培德

2009 〈荷蘭時代臺灣各港之間的貿易變遷〉，收於黃富三編，《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頁15-39。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4 〈二林地區：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彰化平原與濁水溪沖積扇北半部人群的地域區劃〉，《白沙歷史地理學報》（彰化）15: 21-45。

2019 〈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下南瀛及周遭地區的漢語地名〉，收於劉益昌、賀安娟（Ann Heylen）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Ⅴ：早期南瀛》，頁81-104。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張 燮（著）、謝方（點校）

2000 《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

張瑞津、石再添、陳翰霖

1997 〈臺灣西南部嘉南海岸平原河道變遷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報告》（臺北）27: 105-131。

曹永和

1995 〈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74-113。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5 〈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295-36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世旻

2019 〈初探清領時期的地理位置觀念：以「石佛凌波」為分析的對象〉，《史穗》（臺南）10: 21-69。

連 橫（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4 《雅堂文集》，臺灣文獻叢刊第20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 侃、高澄

1970[1534] 《使琉球錄》，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使琉球錄三種》，臺灣文獻叢刊第28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 第

1959 〈東番記〉，收於沈有容等輯，《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第59種，頁24-27。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佳榮、朱鑿秋（執行主編）

2016 《中國歷代海路針經》，下冊。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

陳宗仁

- 2003 〈「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臺北）21(2): 249-278。
- 2005 《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8 〈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臺北）41: 109-164。
- 2010 〈明朝文獻中「雞籠」與「淡水」地名的出現及其背景：兼論十六世紀下半葉北臺灣海域情勢的轉變〉，收於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主編，《海洋文化論集》，頁 225-254。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2013 〈Selden Map 有關中國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發表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第 9 屆文化交流史暨輔大歷史學系在臺 50 週年：傳承與涵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北：輔仁大學野聲樓一樓谷欣廳，11 月 10 日。
- 2014 〈Selden Map 有關朝鮮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曹永和文教基金會、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研究所主辦，「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館北棟 3 樓第一會議室，7 月 14 日。
- 2016 〈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臺北）23(3): 1-42。
- 2018 〈Mr. Selden's Map 有關日本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收於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頁 359-401。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周鍾瑄（主修）、陳夢林（總纂）

- 1962[1717] 《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龚纓晏、许俊琳

- 2015 〈《雪尔登中国地图》的发现与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北京）2015(3): 100-105。

費宏

- 2000 〈送福建按察司副使陸公君美序〉，收於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 9，頁 4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慎懋賞

- 1985 《四夷廣記（中冊）》，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輯，《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鄭若曾

- 1983 《鄭開陽雜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

- 2007 《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

鄭舜功（撰）

- 出版年不詳 《日本一鑑·桴海圖經》。出版資訊不詳，民國 28 年影印本。

盧嘉興

- 1981 〈曾文溪與國賽港〉，收於臺南縣政府民政局編校，《輿地纂要》，頁 61-90。臺南：臺南縣政府。
- 1981 〈臺南縣古地名考〉，收於臺南縣政府民政局編校，《輿地纂要》，頁 27-48。臺南：臺南縣政府。

蕭崇業、謝杰

1969 《使琉球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魏德文、賴志彰（編）

2018 《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顧祖禹（著），賀次君、施和金（點校）

2005 《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

Batchelor, Robert

2013 “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A Chinese Map of East Asian Shipping Routes, c.1619.” *Imago Mundi* (London) 65(1): 37-63.

Cheng, Weichung 鄭維中

2015 “Sailing from the China Coast to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Dutch Sailing Pattern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aris) 101: 289-323.

de Barros, João

1777 *Décadas da Ásia III*. Lisboa: Na Regia Officina Typografica.

Ortelius, Abraham

1991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Kyoto: Rinsen Book.

## **Taiwan and Ryukyu in Selden Map: A Cartographic and Toponymic Analysis**

Tsung-jen Chen

### **ABSTRACT**

Thanks to its atypical qualities and the mystery behind its creation, the so-called ‘Selden Map’ has received plenty of academic attention following its rediscovery in 2008. This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map uses seemingly traditional Chinese map-making techniques to depict Ming China, Joseon Korea, Japan, as well as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ast lines of Southeast Asia exhibit great similarity with modern maps, unlike any other contemporary works.

Taking the analysis of Ryukyu and Taiwan in this map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elden Map is a combined work and represents a hybrid of contemporary Overseas Chinese and European sources. Analysis on the depictions of Ryukyu and Taiwan revealed that the painter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se two areas, and used them only as navigation indicators for Japan. In addition, Taiwan’s waters are marked with two place names “Beigang (北港)” and “Jialilin (加里林)” which, a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were important ports of western Taiwan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Maritime Asia, Shipping Route, Selden Map, Cartography  
History